



XIAOXUESHENGCONGSHU



小学生丛书



我 爱 妈 妈

献给妈妈的孩子和孩子的妈妈

要问人间的各种感情当中，什么感情最美好，最迷人，可能有不少人会说是“爱”；要问各种的爱当中，什么爱最天然，最忘我，可能有不少人会说是“母亲”。

是啊，我们谁的身上没有母亲的体温、母亲的汗迹、母亲的指纹和母亲的唇印？有人把母亲比作大海，比作大地，比作太阳，比作月亮。这些虽属文学的夸张，也足以反映母爱的博大。

有“母爱”就会产生“爱母”之情。我们看，哪个婴儿刚刚接触世象的眼睛，最依恋的不是母亲的慈颜？哪个娃娃的第一声语言不是“妈妈”？儿童们最感安全温暖的环境，往往是母亲的怀抱；他们最感悲伤痛苦的遭遇，往往是失去了妈妈。

当然，这种本能的“爱母”之情虽然纯真动人，可不

是人人都能持久的。儿童长成了少年，少年步入了成人，他们的生理、心理都起了变化，他们同外界的接触一天天地丰富起来，他们逐渐有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是非标准，在童稚的“爱母”之情上，掺入了来自不同的社会影响、道德观念、好恶情绪、利害关系等等的色彩。于是，有的人始终怀着“寸草当报三春晖”的情感，尊敬母亲，体贴母亲，理解母亲，既善于接受母亲的正确教导，继承母亲身上的优良品格，又善于剔除母爱中的不理智因素和母亲自己身上的消极成分。有的人则只知享受“母爱”给予自己的幸福，不愿作“爱母”的奉献，甚至“子嫌母丑”，厌恶母亲。

其实，享受他人，包括母亲的爱是一种幸福；而懂得爱他人，当然也包括爱母亲，何尝不也是一种幸福，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呢？

这本书里收集的十篇文章，都是由不忘母爱的子女写他们的爱母之情。十位作者中多半是年轻人。他们都出身于寻常百姓家，都是些普通人，但是在各人的身上也都有一点小小的值得羡慕的地方。你看：庞天舒从15岁就开始发表小说；刘丽和她的妹妹都是少年大学生；吕青山刚到18岁就跨入共产党员的行列；李杰和哈黛虽然曾经沾上“被耽误的一代”的边，但是一个靠自身的努力，成为留美博士生，一个以深邃的目光

看到教育事业的前景,按自己的理想找到小学教师的位置;就连生长在贫困海疆、15岁就成为高位截瘫残疾人的钱亲华,也掌握了剪纸艺术,得到“自强不息的好青年”的称誉。

这些年轻人取得成就,因素当然有很多,但是他们都没有忘却母亲给自己的铺路之功,所以在文章里以真挚和情愫,记叙自己在妈妈正确的母爱下,怎样成长。他们都沉浸在感激母亲、热爱母亲的幸福之中。

著名女作家冰心的女儿吴冰已经是年逾半百的大学教授。当她回忆起妈妈的影响时,仍然为母亲教自己从小学习如何做人,“做一个争气的中国人”而“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母亲和子女之间的爱,无疑意味着血统的关联。但是他们又不受血统的局限。老山功臣徐良感受到的母爱,除了自己的妈妈,还有战友们的伟大母亲;艺术大师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的继母廖静文对她的深存感情,胜过了生身母爱;北京有五个曾经是孤儿的兄妹,他们蒙受的母亲,是那样众多的人的无私的帮助。看了他们的文章,我们似乎感到母亲的进一步升华。

如果妈妈的孩子们看了这本书,能激起一点珍惜母爱的感情和在正确的母爱下学会做人的理智;如果孩子的妈妈们看了这本书,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母

爱更有利于子女永远尊母、爱母”的启示,那么,这对我们作者和编者,也将是一种幸福的精神享受。

编者



目 次

献给妈妈的孩子和孩子的妈妈	编 者	1
怀有童心的妈妈不会老	吴 冰	1
我们是无“沟”的两代人	哈 黛	14
我爱妈妈这代人	吕青山	29
“我是浪,您是海岸”	庞天舒	40
来自大洋彼岸的思念 - - -	李 杰	53
我们这对特殊的母女	徐静斐	70
假如我不听妈妈的指导	刘 丽	86
光荣匾也有妈妈的一半	钱亲华	97
战士和妈妈	徐 良	114
我们的妈妈们	周同山等五兄妹	124

怀有童心的妈妈不会老

吴 冰

我常常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因为我是我父母的女儿，我至今还能得到 87 岁的妈妈的母爱。父母亲送我上学，又教我如何做人。童年的生活的家庭教育，我至今未忘。我只希望这一生能不辜负他们的培养，做一个争气的中国人。

“您今天又有外事活动吧？”

我的妈妈是老作家谢冰心。从外表和装束上看，妈妈和许多与她同龄的中国妇女没有多大差别。我记得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住在四川省歌乐山时，妈妈常穿的是阴丹士林的蓝布大褂。那时我 10 岁左右的哥哥正是淘气的时候。他弹弓打得极准，当时歌乐山住

宅门上新钉的搪瓷白底蓝字的门牌号，就是他弹射的目标，因些有许多人来我家告状。找上门来的陌生人常把去开门的妈妈当作我们家的保姆。

解放后，尽管她多次出国，做了些质量好而颜色素静的衣服，但是她在家里总是爱穿旧衣，她说旧衣服穿着舒服，干起家务事来也方便。以后，只要她穿得稍为整齐一些，人们见了就会客气地说：“老太太，您今天又有外事活动吧？”这些在我们家里都成了笑话。

独特的“休息”方式

我们家里虽然总有帮忙的女工，妈妈也还是天天忙着干家务。她最喜欢做的是收拾房间，或把茶具、餐具等洗得干干净净。插花也是她的爱好之一，除了香味太浓的花以外，只要是鲜花，她都喜欢。在歌乐山时，她经常采些野花插在各种别致的花瓶里。

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时，看到的多是妈妈拿着块抹布东擦西擦，很少见她在伏案写作。我有些纳闷，她那些文学作品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她独特的“休息”方式，她往往利用做家务劳动的时间来打腹稿。

勤快、爱整洁的妈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安逸、温

馨、美好的家庭环境。这个家，从抗战前燕京大学燕南园的教授住宅搬到了云南呈贡乡下；从四川歌乐山的小土房搬到重庆宽仁医院的楼上；从日本东京的小洋楼搬到北京洋溢胡同的四合院和中央民族学院四居室宿舍楼，我们的家有时简陋，甚至拥挤，有时宽敞。妈妈总是尽力把它收拾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回到家里就感到十分舒适、快乐。

治懒带给我的好处

妈妈从来不在晚上写作，因为这会使她失眠。她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也不许我们睡懒觉；即使是节假日，只要阳光照进屋里，她就会进来掀我们的被子，催促我们起床。她还不喜欢我们在家里穿拖鞋，说这会给人一种懒散的印象；她不喜欢我们嗑瓜子，吃花生，把瓜子、花生皮丢得满地。

她所要求的，我们虽然没能样样做到，还是养成了早起和整洁的习惯。现在算起来，因为不睡懒觉，几十年来我争得了不少时间。也不要小看“眼里有活儿”的习惯，1980年我到美国进修一年，无论是到人家里做客或是小住，都往往因为能主动帮助主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而使他们感到意外高兴。

和睦互勉的“小细胞”

妈妈对家庭这个社会中最小的细胞非常重视。她认为和睦的家庭可以培养出身心健康的孩子。妈妈常说一家人相亲相爱，互勉互助，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苦难都能度过。

事实确此如此。我们从婴儿成长到青年的年代，正是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抗战、解放反右、“文革”等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家庭生活。家里的日子有时过得清苦，有时各人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中父母甚至受到了人身侮辱，但是大家都挺过来了。

母亲常说：“关键时刻感到家庭温暖和理解的人是不会自杀的。”的确，众叛亲离恐怕是对一个人最深、最大的打击。她认为在重要的是非关头，家里人的一推、一拉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她从不在我们受到冲击时为着安慰我们而说些无原则的宽心话。反右期间，哥哥被错划成右派，送到汉沽盐场劳动，我也因“严重右倾”下决心毕业后到甘肃去“脱胎换骨”地改造。妈妈送我们上路时没有流露出一丝悲伤，也从没有说过一句“拉后腿”的话。

每当我想起这些，总是对她充满感激之情，妈妈真是“爱子有方”呀！她没有试图把我们留在家庭的小天地里，在我们人生旅途的艰难时刻，母亲的眼泪只会增加我们的心理负担，使我们前进的步履变得更加沉重。至今，我仍然觉得我在甘肃生活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也是最值得回忆的十几年。年轻人不到祖国比较贫苦的地方去，就不会懂得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艰难，就体会不到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担子有多重！

妈妈的“安慰”、“骄傲”和“快乐”

妈妈对我们兄妹三人的教育是德智并重，尤其注重德育。她能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和缺点对我们进行帮助。

哥哥小时特别淘气，学习成绩有时不佳。但是他心眼儿好，能体贴大人。一个冬天的夜晚，妈妈不知为什么生气打他，他一面躲闪，一面转过身来给妈妈披衣服，并说：“娘，别着凉了！”因此妈妈常说哥哥是她的“安慰”。

我从小用功好强，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妈妈从来不用在这方面为我操心，她说我是她的“骄

傲”，但也并不因此而特别偏爱我。

妹妹小时象男孩子一样好动贪玩，到考试前妈妈帮她复习时，发现她记忆力好，能背书，随便指一段书，她都能从头背到底。妈妈就拿一张纸，中间挖个洞，遮住了其他的文字，这样妹妹就念不出来了。每逢考试，她少不了挨打手心。但是妹妹活泼，喜爱小动物，富有同情心，爱帮助人，妈妈说妹妹是她的“快乐”。

在众多的品德中，母亲最注意的恐怕是心地善良了。她常通过讲故事来教育我们。在歌乐山时和我们

同住的还有我三舅舅的几个孩子。每当大家功课做完后，最快活时刻就是围在妈妈身边听她讲各种中外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狄更斯的《大卫·



科波菲尔》，主人公悲惨的童年让我们流了许多眼泪。故事一个晚上讲不完，于是连续多日大家都是赶快做完功课，急急忙忙吃完饭，然后各自把小板凳和小手绢准备好，等着妈妈继续讲下去。

惩 罚

我们小时候也犯过许多“错误”，如因为馋而偷吃糖果、糕点，在好奇心驱使下想尝尝香烟的味道等等。这些妈妈肯定都发现了，因为床上常留有饼干桶的印子，我们嘴里有烟味等等。但我不记得我们为此受过什么惩罚。

妈妈最恨的有两样：一是大孩子欺负小孩子；二是说脏话。一次我和妹妹吵架，两个都用听来却不明白的“×你妈”对骂，妈妈为此非常生气。她使用的惩罚方法很特别，先是用肥皂洗嘴，然后灌奎宁水。奎宁这种药是治疟疾的，其苦无比。妹妹吓得跪下讨饶；我的脾气很犟，赌气喝下苦水后，就跑到山上的树上站着，到天黑也不回家，最后还是妈妈拉着妹妹去把我找回来。

我小时还有个遇到烦心的事爱迁怒于人的坏毛病。每逢我犯脾气时，妈妈总是拉着妹妹说：“咱们走，

别理她！”这使我更加恼怒，但是身边没有撒气对象，过了一阵子，自己也觉得没趣。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从不干预我们玩耍。小学时，妈妈的一位美国朋友送给我们一种叫“垄断”的玩艺儿。那是一种在纸盘上掷骰子的游戏。各人的子儿走到某格，那里可能写着再前进多少步或后退多少步，或者能得到多少“钱”，或“罚款”多少。钱多的可置地买房子、盖旅店。你买的小小木房子放在某格内，别人的子儿若停在这里，要向你付款。这种游戏曾一度使我们着迷，赢的自然兴高彩烈，输的免不了气得脸红脖子粗。一次，大家玩急了，争吵起来，母亲再也耐不住了，她一把抓过纸盘来撕得粉碎。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玩过类似赌博的游戏。

“不愿意你们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母亲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从不忘记自己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应尽的义务。作为中国人，她热爱祖国，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我们从童年时期就受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

旧中国贫穷落后，不能和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算是五强之一，但是

实际上却没有相应的国际地位。抗战胜利后，我们家在日本时，英国、美国人对中国人的高傲和优越感，常常刺痛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母亲平日是很反对男孩子们打架的。有一次，我们认识的、就读于东京美国学校的吴家兄弟二人，由于受不了外国孩子对中国的侮辱，卷入了一场恶斗。母亲听说这事时，却对这两位少年的骨气十分赞赏。他们的事迹后来被她写进短篇小说《回国以前》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了。抗美援朝初期，我们家还在东京，每当听到志愿军胜利的消息，都有说不出的欢快与自豪。父母亲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使祖国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处境而对它产生了极大的敬意。1951年，他们借赴美教学的机会，悄悄地带我们取道香港回国。

回国后，他们两人，尤其是我父亲，在历次“左”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过冲击，在“文革”期间更被打发去扫厕所，并挨过打。父母亲胸前曾挂着牌子站在“抄家物资展鉴会”前示众。但是他们对子回国，却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后悔。他们总是把祖国的命运同自己的命运连在一起，只要祖国繁荣富强，个人受点委屈就算不了什么了。

实际上，我国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父母

的朋友和我的可敬可亲的老师们，都表现出了这种高尚的情操。他们中间，有的解放前就闻名于世界，在国外已有固定的工作，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有的无论何时到国外去，都会享受到比国内优越得多的工作条件与生活待遇。但是他们并不为个人的名利和小家庭的舒适和安逸而活着，他们有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使命感。

我曾问过母亲：“如果是国民党当政，您是不是还带我们回国？”她说：“那就要考虑了。不过，当时我是不愿意你们做‘白华’，不愿意你们跟外国人结婚，忘了祖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热心的老师和师母

母亲在她家中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我当海军的外祖父常年在外，外祖母又体弱多病。作为女儿和姐姐，她从小懂得为父母分忧，从生活和学习上照顾家计，帮助弟弟。她从19岁当学生时开始写作；后来她做了教师；和我父亲结婚以后又成了师母。

她对自己和父亲的学生非常关心。有的学生谈恋爱了，妈妈会给他们指导；有的学生失恋灰心时，妈妈耐心地给予安慰；有的学生结婚，妈妈热心为他们操

办，从打扮新娘直到准备婚后的生活，她都考虑到了；连小两口吵嘴上门告状的事她也管；他们生了孩子常来请母亲给起名字。

我们小时候常见家里有父母亲的学生来，有高兴的，有忧伤的，有笑的，有哭的。他们把妈妈当作亲人，妈妈也把母爱分给了每一个人，对他们有安慰，有鼓励，有批评。大概是以为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吧，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从不避忌我们。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暗地里对他们也有评论，说这些人真是又“傻气”，又“可笑”。可妈妈对他们却总是一片真心。

名利淡如水

妈妈富有同情心，又十分慷慨。几十年来，她写过许多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仅自1980年以来，各出版社就编辑出版了17本她的文集和作品。外国翻译家也曾把她的作品译成日、英、德、法、意、捷、黎等国文字出版。）她用拿到的稿费不知支援过多少亲友。

家里的东西和收到的礼品，她常常很快地就送给了别人。她惦记的人很多，从家乡的长辈、堂表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后代，直到作协年轻的同事和司机，以及他们的儿女，都收到过她的小礼物。